

8代人修了半个北京城，“样式雷”给今天留下什么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江西省永修县，古称艾地，地处江西北部、鄱阳湖西岸。在永修县梅棠镇，一处修旧如旧的民居，走出过一个传奇家族。一家“样式雷”，半部古建筑史。“样式雷”是对清代雷氏建筑世家的誉称。自清康熙年间起200余年里，雷氏家族8代几十人，累世供职宫廷样式房，主持、参与皇家各类建筑工程。北京故宫、天坛、颐和园、圆明园、清东陵、承德避暑山庄等著名文化遗产建筑背后，均有雷氏家族的身影。中国目前39项世界文化遗产，5项与其有关。

2003年，清代“样式雷”图档入选第二批《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》；2007年，又列入第二批《世界记忆名录》。第一代“样式雷”雷发达，出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年）。明末战乱频仍，为了家庭生计，雷发达的父亲和叔叔，从江西南康府建昌县（今江西永修）举家迁往金陵（今江苏南京）。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冬，雷发达与兄弟赴京参加皇家宫苑的营建。此后，雷发达的长子雷金玉继承了父亲的事业，并成为雷家世代执掌样式房、主持皇家建筑设计事务的真正开创者。

近日，首届“样式雷”世界记忆遗产研讨会在永修举办。在南方连绵不尽的春雨中，当雷氏后人雷章宝再次踏进这处祖屋，时间已经过去了400年。

在世界记忆遗产中看到“人”的价值

“样式雷”图档是国家图书馆的特藏之一。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张志强说，“样式雷”图档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关于中国古建设计理念和方法的建筑档案，终结了世界建筑史上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理念和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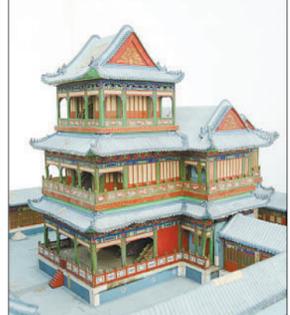
国家图书馆馆藏“样式雷”图档大部分在民国年间购得，主要来自两个渠道：一是直购自“样式雷”后裔，二是购自书店。

1930年，家住北京西直门东观音寺胡同的雷氏嫡支雷献春，有意出售先辈度藏的大量图档。时任中国营造学社社长的朱启钤得知消息，迅速造访雷宅。经朱启钤斡旋，北平图书馆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支持下，购得首批“样式雷”图档共计数百种，其中烫样27箱。

1930年年末，居于北京西城车水胡同的雷氏别支雷献祥之子雷文元，也开始出售家藏烫样，同样经中国营造学社斡旋，



江西省永修县，“样式雷”祖屋。永修县委宣传部供图



“样式雷”图档之颐和园戏楼烫样。故宫博物院藏



“样式雷”图档之颐和园藻鉴堂地立样。国家图书馆供图

由北平图书馆购存。此后，北平图书馆又从雷氏后裔手中购得零星图档，并各处访求，陆续从五洲书局、群英书店、德古堂、澄观阁等10余家古旧书店购得图档3000余件。

“从‘样式雷’图档入藏的第一天起，国家图书馆就意识到它在中国建筑史、建筑学上的重要意义，设立专藏，并不断补充。现在存世的‘样式雷’图档逾2万件，国家图书馆藏约1.5万件，占总量的四分之三。”张志强说。

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、图组组长白鸿叶介绍，“样式雷”图档涵盖建筑选址、设计、施工、修缮、改建等环节，是完整而系统的建筑图样和文字档案，无论规模，还是系统性和完整性，都是世界范围内现存古代建筑档案中少有的。

“样式雷”图档作为世界级遗产的价值不必赘言，研究者在宏大叙事背后，也看到历史的细节与“人”的价值。

白鸿叶说，有些图档记载的内容从特殊角度反映了清末社会的变化与发展。例如，西方舶来品不断进入中国，最早享用这些新鲜事物的当属皇室。慈禧可谓北京城使用电灯的第一人。相关的“样式雷”图档有《文昌阁东建修电灯房院图样》《颐和园乐寿堂前电气灯架图样》等。

“‘样式雷’图档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精神文化遗产的首次，甚至是唯一的大规模记载。第五代‘样式雷’雷景修悉心收集，我们才能看到目前传世的绝大多数图档。”白鸿叶说，“其中，家信类文档记录了古代工匠的日常工作和生活，具有双重功能，

不仅可以记载客观人物、事件、事实等，还可以反映人物的主观情绪、情感等。”

如果工匠精神需要代言人，“样式雷”必居其一

今天提到“样式雷”，总是会谈到“大国工匠”“工匠精神”，那究竟什么是“样式雷”的工匠精神？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翁莹莹是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“国家图书馆藏‘样式雷’信札整理与研究”的负责人，她总结为：敬业专注、恪尽职守；科学严谨、精益求精；团结协作、顾全大局；积极进取、突破创新；严于家教、注重传承。

“敬业专注体现在，8代人在样式房，他们并不是没有别的职业选择，也不是没有遭遇过重大挫折，但他们选择了坚持。在‘样式雷’家信中经常有雷家人带病上工的记载，甚至因公病逝的也不止一例，十分恪尽职守。”翁莹莹说。

敬业专注、恪尽职守是一种就业态度，科学严谨、精益求精则是一种工作状态。科学体现在哪些方面呢？翁莹莹介绍，第一，样式房工作有法可依，统以《工程做法》或《内庭工程做法》为依据；第二，“样式雷”图档详细记录了传统建筑工作流程的每一步，包括选址勘测、规划设计、工程施工、内檐装修等；第三，工程设计方案分为平面图样、立体烫样和文字性的工程做法册，其中平面图样又有准样、细样、进呈样、糙样、废样等，不同阶段均可相互参照。

积极进取、突破创新是“样式雷”的立业根本。“样式雷”创新性地将中国传统的“平格图”运用于立体建筑的绘制，平格法与现代DEM制图效果表现出惊人的一致；而烫样（中国古建筑的立体模型——记者注）则是“样式雷”的独家秘技，被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，所有烫样均可层层拆卸，建筑内部的梁架结构、彩画式样一览无遗。

团结协作、顾全大局体现了“样式雷”的大局观。皇家建筑工程浩大，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或者一家之力完成，需要通力合作，甚至妥协平衡。在“样式雷”家信中有很多这方面记述，其中出现最频繁的特点是：一是小辈之间在生活中要相互包容，工作中要相互商量；二是家族成员之间要团结一心、互相帮助；三是同事、同行之间要明确各自职责，以完成工事为基本原则。

严于律己、注重传承体现了“样式雷”的传承观。翁莹莹特别提到，“样式雷”非常注重家庭教育，一方面是学习书面知识，一方面是下工地实践，在当时，“样式雷”应该也学习了一定的西方建筑技艺。而传承也

是两个方：一是手工技艺的世代传承，二是图档的世代传承。

“我们研究古人、古代文献，归根结底是为了今天的人和社服务。‘工匠精神’如果需要代言人，‘样式雷’必须是其中之一。在我国，中高等职业教育在未来是非常有发展潜力的，我相信这方面也是‘样式雷’工匠精神可以发挥的地方。”翁莹莹说。

让古籍里的文字“活”在当下

白鸿叶谈到，近10年来，圆明园、北海、颐和园、故宫博物院、恭王府、避暑山庄等机构，不断来查阅、咨询、复制、研究“样式雷”图档，用于复建、维修。图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，实现了让古籍里的文字“活”起来，在现实中发挥作用。

张志强介绍，针对“样式雷”图档，国家图书馆主要开展了三个方面的工作。首先是编目整理，2007年到2009年，国家图书馆完成了全部“样式雷”图档的机读数据编目工作，共计14396条；到2024年底，“样式雷”图档数字资源库的建设将全部完成。其次是修复与保护。“样式雷”图档尺寸不一，最小仅有巴掌大小，最大约5平方米，最长达6米。2014年，“样式雷”图档采用博物馆级别的保存柜，实现专柜保存。但由于年代久远，部分“样式雷”图档保存状况较差，修复工作在持续进行。

第三是揭示与利用。国家图书馆为专家学者和相关机构提供图档借阅、咨询等服务，从2015年开始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陆续高清图档彩色印刷出版《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》圆明园卷、颐和园卷、畅春园卷等数十卷，最终将完成所有图档的出版，使“样式雷”图档真正面向社会。

在首届“样式雷”世界记忆遗产研讨会上，南昌大学副教授马凯表示，南昌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在赣派建筑研究中，将“样式雷”文化摆在了突出位置。清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馆长陈迟对“样式雷”文化提出了多元化的传播策略，包括主题展览、学术研讨会、沉浸式体验等多种形态；同时，通过与现代文化的结合，如文创产品开发、虚拟建筑设计等，使“样式雷”文化更加贴近现代社会，增强其吸引力和影响力。

今年，永修县完成了“样式雷”祖屋的修缮工作并开设展览，让大家可以更加直观清晰地走进这个传奇家族。



扫一扫 看视频

一个考古学家的遗产

纪念考古学家安志敏百年诞辰

郭静超

中国考古学界有一位著名人物——安志敏（1924年4月5日—2005年10月26日）。他引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快速发展。他将一生倾注于田野考古和调查，被外国同行评价为中国田野考古的领军人物。他专注于做学问，出国访问时，别人安排他逛街看景，他觉得那是“浪费时间”。他一生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，认为黄河流域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心，是“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”。他也因为这样的坚持，在20世纪末参与了一场有关文明起源的激烈争鸣。由于敢于批评和质问，他也被人称为“直筒子”“大炮”。2024年，安志敏百年诞辰，他所留下来的丰厚遗产，依然被后人珍视。

得遇名师：裴文中、梁思永、夏鼐……

安志敏出生于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岛上的一个望族。父亲是企业家，家底丰厚。但安志敏对经商毫无兴趣，专好读书。儿时祖母给他用来买早点的钱，他都悄悄攒下来买书。1941年，安志敏前往北平读书，开始对考古感兴趣。1944年，他考入中国大学考古系，获得史学家齐思和、史前考古学家裴文中之赏识，还通过史学家翁独健介绍，结识日本著名考古学家鸟居龙藏。他经常骑着一辆英国的风头自行车，在颠簸小路上骑行十几公里去向先生求教。大学毕业后，他进入燕京大学，成了裴文文的助手。第二年，便能代替老师讲授史前考古学。同时，他也在北京大学史学研究所考古组开始研究生学习。中国第一位考古学专业出身的考古学家梁思永，便是他的导师。

1950年，他辞去燕京大学教职，在梁思永的推荐下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。10月，他跟随英国留学归来、具有国际水准的考古学家夏鼐，到河南省辉县进行发掘工作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认为，安志敏后来坚持田野考古的道路，以新石器时代考古为主，又能兼顾旧石器时代和史前考古研究，同时，他的视野开阔、研究领域广、钻研又深，应当跟他所受的专业训练和多位老师的言传身教有很大关系。

主持发掘：提出“中原中心说”

工作后，安志敏迅速成长。28岁时，他就开始主持在河北省唐山市贾各庄的田野发掘工作。随后的13年，他主持发掘工作10余次，几乎每年都要进行发掘或调查，地点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，也涉及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。

1956年，安志敏在河南省陕县庙底沟和三里桥遗址进行发掘工作。发掘历时两年，揭露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。发掘结束两年后，报告《庙底沟与三里桥》出版。

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认为，安志敏在20世纪50年代所做的考古发掘中，以庙底沟和三里桥最为重要，影响也很大。他将庙底沟遗址的年代分成较早的第一期和较晚的第二期。第一期仰韶文化，第二期是介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过渡文化。20世纪30年代梁思永等发现龙山文化。但学界一直在讨论两者的关系问题，孰早孰晚，没有定论。通过安志敏发现和命名的庙底沟二期文化，人们从此弄清仰韶文化—庙底沟二期文化—龙山文化这样的从早到晚的关系问题。这在考古学史上是一件大事。

陈星灿说，若将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作一个断代式的总结，可以看到以下变化：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，安特生通过对仰韶文化彩陶与西方彩陶，提出仰韶文化可能是西来的假说，即“中国文化西来说”。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现龙山文化，学界认为仰韶文化向东发展，龙山文化向西发展，即所谓“东西二元对立说”。第三阶段，安志敏提出了“庙底沟二期文化”，说明了至少豫、晋、陕一带的龙山文化，是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，再加上同时代黄河流域其他地区的发掘，更强化了中原地区文化发展的连续性，进而形成“中原中心说”，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。

“《庙底沟与三里桥》这份报告标志着—个时代的终结，它改变了原来的东西二元论，代表着中原中心论的开始。这一时期的其他发掘，如洛阳王湾遗址的发掘也说明了这一点。但在那个时代里，安志敏是‘旗手’。”陈星灿说。



①安志敏（1924—2005）。②青年安志敏。③安志敏在河南裴李岗考古工地。④安志敏在河南辉县发掘。

社会性质的最重要资料。实际上，安志敏所做的其他发掘和调查工作，都会在当时的随后几年内发表报告或简报。透过安志敏的日记，人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勤奋及其背后的动因——热爱。在洛阳发掘时，工作进程很快，安志敏接到夏鼐来信，受到表扬：“接夏所长来信，对同仁工作努力表示嘉奖。”出国考察时，当地安排他逛街看景，甚至品尝农家葡萄酒，他觉得这样的安排“完全是在浪费时间的”。

著书立说：喜欢读书，喜欢行走

上大学时，安志敏就发表有关考古、历史的研究文章以及相关书籍的书评作品，数量超过30篇。到考古所工作后，“文革”前，他除了完成发掘报告、调查简报，还撰写了大量专题类的文章；“文革”结束后，考古工作逐渐恢复。1979年，安志敏撰写文章探讨裴李岗文化、磁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，将仰韶文化的源头追溯到更久远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。陈星灿说：“这一考古发现，无形

文章，引起了外国学者的重视。他也探讨中原地区青铜器和铁器与西方的关系问题，不排除中国文明自身发展中的外来因素。

学术争鸣：他是纯粹的学者

随着更多地区考古工作的开展，人们意识到，中原以外的很多地区也存在独具特色、来源互不相同的新石器文化。中国文化的多元起源已成为学界的共识，安志敏也撰文表达了相同观点。

但“文化”与“文明”的概念不同，“中国文化起源”和“中国文明起源”又有所不同。1987年，安志敏对苏秉琦提出的“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一样分布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”的说法提出质疑。他在《中国后期新石器文化》一文中，再次强调“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心”。

韩建业说：“对于安志敏的这种坚持，我觉得应该辩证地看。早年由于材料的局限，他认为中原最重要，什么最早。这当然是不对的。但是，他始终强调黄河中游、中原地区的中心地位，我觉得这是不应该轻易否定的。在新石器时代，从早到晚的很多关键时期，中原或黄河中游地区都有中心地位。我是反对简单地否定中原中心论的。”

对于这样的学术讨论，韩建业认为：“我的老师严文明先生告诉我，学术应以求真为第一宗旨。苏秉琦和安志敏的观点都有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和学习的方。”

陈星灿认为，在文明起源的问题上，安志敏和苏秉琦对文明概念的理解不同。安志敏把中国文明的起源追溯到二里头。“安志敏之所以坚持己见，是因为在那个时代，新的概念和说法出现之时，他保持着一种警惕和审慎。同时，在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模式下，苏秉琦和张光直更强调多元，而安志敏更强调一体，严文明的‘重瓣花朵’理论则处在中间，强调以中原为中心的‘多元一体’。安志敏的坚持起到了某种平衡作用。”

安志敏参与的学术讨论并不局限于此。他直言不讳，敢于批评，常引得对方不满，还因此得了一些不太好听的绰号。陈星灿说：“我觉得那些话反倒说明了先生的优点：他是纯粹的学者，不世故圆滑，他也不屑于此。他的世界里就是做学问。”

有人说，学术离开了批评，赞美就失去了意义。英国考古学家保罗·巴恩（Paul Bahn）编著的《考古学历史》（2013年）一书中，用两页篇幅介绍了安志敏的生平。作者评价他为中国田野考古的领军人物，将一生精力倾注于田野考古和调查，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领域的重要代表。

韩建业说：“安志敏先生的很多研究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，不断激发我们深入思考。”

陈星灿说：“作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考古学重要的代表性人物，安志敏先生的考古学生涯及学术成就，是20世纪中国本土考古学成长、发展和壮大的缩影，值得我们珍视。”（感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其成对本文的大力支持）



「士别三日」的他，因读书让人「刮目相看」

吕蒙为三国时期东吴大将，是人们熟知的那句成语典故“士别三日，刮目相待”的主人公。正是靠着读书，吕蒙让孙权、鲁肃等比他知名度更高的三国群雄刮目相看，后世也一直把吕蒙当作发奋读书的典范楷模。其实，吕蒙的读书并不是头悬梁、锥刺股之类的苦读，他自有一套以问题为导向的读书之道。

吕蒙本是中原人氏，在东汉末年中原战乱时南下，投奔到孙氏江东基业的开创者孙策帐下，年仅十五岁便上阵杀敌，逐步成长为孙氏政权的重要将领。

吕蒙虽然作战勇猛，但“少不修书传”，年少时不喜读书。成为镇守一方的大将后亦是如此，“每临大事，常口占为笺疏”，起草一般的文告奏疏都非常吃力，几乎通篇都是词不达意的口语白话。

据《江表传》，孙权见吕蒙，劝他“当涂掌事，宜学问以自益”——如今身居要职，要努力读书提高能力水平。吕蒙刚开始不以为意，言道“在军中常苦多务，恐不容复读书”，推脱军务繁忙，无暇读书。孙权不悦，说“卿言多务孰若孤”——你执掌一军的忙碌程度能比我处理朝政的日理万机吗？孤年少时就读完“诗、书、礼记、左传、国语”，接过父兄大位统领江东大政后又继续阅读“三史、诸家兵书”，读后“自以为大有益”。

孙权现身说法后，还用孔子“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，无益，不如学也”的语录，以及前人光武帝刘秀“手不释卷”和同时代曹操“老而好学”的事迹劝吕蒙“急读”，并为他开列“孙子、六韬、左传、国语及三史”书单。吕蒙见孙权谆谆教诲，回去后“始就学，笃志不倦”，一心一意发奋读书，不仅读完孙权所列书单，更大量阅读其他书目，“其所览见，旧儒乃不胜”，知识面丰富远超一般儒生。

有一次，鲁肃到吕蒙驻地视察，与他谈经论道后大吃一惊，拍着吕蒙后背说“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”，说自己以前只把吕蒙当作一介武将，如今看来却是“学识英博，非复吴下阿蒙”。吕蒙表示“士别三日，即更刮目相待”。而真正让吕蒙刮目相看的，不仅仅是吕蒙通过读书换来学识渊博，更是他通过阅读，运用书本知识制定针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。

在吕蒙所处的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形势中，孙权、刘备在曹操的强大压力下抱团取暖，结成联盟共同抗曹。然而，在孙刘表面联盟的友好关系之下，却隐藏着因荆州归属问题形成的裂痕。正是在读书的基础上，吕蒙胸中渐有丘壑，对孙刘联盟的内在矛盾有了清醒认识，对自己驻防南郡与荆州关羽的对峙形势有了正确估量。

在与鲁肃的这次会面中，吕蒙将孙刘矛盾摆在台面上讨论，问鲁肃“将何计为第一，以备不虞”，如何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联盟破裂？鲁肃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“临时施宜”，会临机应变见招拆招。

吕蒙提醒鲁肃，“今东西虽为一家，而关羽实熊虎也，计安可不豫定”，如今孙刘两家虽联盟抗曹，但因荆州问题矛盾重重。荆州主将关羽“梗亮有雄气，然性颇自负，好陵人”，将来两家在荆州必有一战，必须预防关羽，及早制定预案。

说罢，吕蒙运用所读《六韬》等兵书中的知识，结合江南江北两方形势和三足鼎立格局，“为肃画五策”，帮助鲁肃制定出五项战略策划。鲁肃大喜，称赞吕蒙“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”。

依靠事先制定“五策”的谋划，吕蒙后来抓住关羽北伐时机，果断袭击下流三郡，夺取荆州，实现全据长江中游的战略目标，进而为东吴坐断江南半壁，为三国中国运最长的政权打造了地利优势。

而“五策”的制定，无疑是吕蒙在孙权教诲下读书的重大成果。否则，当年那个“不修书传”“口占为笺疏”的“吴下阿蒙”，既无暇研究荆州问题，也无法明白孙刘形势，又怎么可能制定“五策”战略，更无力投身为东吴承担夺取荆州的重任。

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奋发读书时。正是在绵延不绝的笔墨丹青滋养下，依靠着包括吕蒙在内的无数华夏先贤阅读实践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得以薪火相传，中国人民自信自强的品格世代塑造。（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，著有《盛世前夜》《水运与国运》《大唐二十帝》《选贤》《资治通鉴》中的用人得失》等）